

# 粮食征购与地方政治： 1957~1958 年安徽省无为县粮食的统购统销\*

徐 进 钟徐楼芳

[关键词] 粮食;统购统销;地方政治

[摘 要] 1950 年代中期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践表明,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期性的饥荒。上下级之间的讨价还价、干部们对于返销粮数量与下拨时间的把握,成为影响农民生存生活状况至关重要的因素。无为县政治生态的异动与粮食问题相交织。推广双季稻、“反宗派主义”、“反瞒产”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展现了地方粮食政治的微妙与复杂。

## 一 引 言

长期以来,1959~1961 年的大饥荒,一直是研究者关注的重点。“天灾”还是“人祸”的争论逐渐平息,如何解释基本一致的制度安排下灾情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和阶层差异开始成为热点之一。例如,林毅夫和杨涛将阿玛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用于解释中国的饥荒,提出中国各地饥荒的差异是因为粮食的分配系统存在“城市偏向”,农民更容易受到饥荒的侵害<sup>①</sup>。龚启圣则将省级领导人的政治倾向作为各省大饥荒灾情程度的解释变量<sup>②</sup>,也值得关注。杨大利提出“代偿式政治表忠心态”的假说,认为下级官僚为了突出表现自己,往往过火地推行中央的政策,而那些共产党员较少和被共产党建立政权较晚的省份推行的措施尤为激烈,因而在由此引致的饥荒中受害更深<sup>③</sup>。不过,他们的上述研究利用的都是已经公布的宏观数据,这些数据都经过后来的修正。曹树基从基层数据出发,通过校正数据,推求各地死亡人口。他所建立的“历史记忆”说发现人们对于历史上灾害事件的记忆与他们应对灾害的行为模式相关。经过饥荒的地区,有着很深刻的饥荒记忆,人们会对粮食更加重视,在浮夸上较为慎重,从而减少了死亡<sup>④</sup>。

笔者认为,欲了解 1950 年代末期大饥荒产生的原因,就必须对大饥荒前史进行深入研究。也就是说,只有对 1950 年代历年的粮食及相关问题逐一考察,才能对大饥荒发生的机制有更深刻的认识。这是因为,1950 年代的中国农村,粮食问题是最主要的政治问题之一。从档案中可见,省委、地委、县委、区委等各级干部之间的政治博弈常常在粮食统购统销的讨价还价上展开。粮食政治成为理解统购统销实施之后 1950 年代农村变迁的关键。

\*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基金)项目“1950 年代地方粮食政治研究——以安徽省无为县为考察中心”(13XNJ024)的阶段性成果。

① 林毅夫和杨涛:《食物供应量,食物获取权,与中国 1959~1961 年的饥荒》(“Justin Yifu Lin and Dennis Tao Yang, Food 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61”),《经济学杂志》(*The Economic Journal*) 第 110 卷第 460 期(2000 年 1 月)。

② 龚启圣、陈硕:《特权阶级酿造成的悲剧:中国大饥荒中的官员晋升激励和政治激进》(“The Tragedy of the Nomenklatura: Career Incentives and Political Radicalism during China's Great Leap Famine”),《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第 105 卷第 1 期(2011 年 2 月)。

③ 杨大利:《大跃进与当代中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8 年第 48 期。

④ 曹树基:《1959~1961 年中国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中国人口科学》2005 年第 1 期。

曹树基的论文《知情、回避与服从：1959~1960年的无为政治》通过研究无为县委决策和实施1958~1960年统购统销的过程，证明了关于粮食总产量的数据有两种：一种是正式文件中书面的“浮夸”产量；另一种则是县委内心知情的“实际”产量。无为县委在该县统购统销实施过程中其实是按照“实际”的产量来决策的<sup>①</sup>。之后，笔者对1956年该县的统购统销实施进行了细致的考察，发现这一年度该县粮食总产量的真实数据仍旧出现于各种正式文件之中<sup>②</sup>。将这两篇文章结合起来，亦即将1956年与1958~1960年相比，无为县的政治生态和干部的行为方式迥然不同。于是笔者将目光转向1957年。在本文中，笔者希望揭示并论证的问题是：1957年无为县的粮食统购统销决策和实施过程是什么？由于县委第一书记的更换，该年度与上一年度相比发生了哪些变化？

## 二 1957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与因应之道

### 1. 内涝还是口粮短缺

1957年1月至5月间，安徽省无为县经历了一场由统购统销带来的粮食危机。农民缺粮，大范围的断炊，人口外流，“各地灾情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sup>③</sup>。1957年上半年，时任安徽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的张凯帆沿江视察内涝灾情。返回省城后，安徽省委书记、书记处第一书记曾希圣询问张凯帆的家乡无为县的受灾情况，张凯帆回答道：“三个字，一路哭！灾情较重。”并建议曾希圣回到曾经工作过的无为县亲自视察。曾希圣到无为后，发现形势确实严峻，便开始组织群众生产自救<sup>④</sup>。

这一时期，关于生产救灾的文字在县委档案中屡见不鲜，无为县委也专门成立了生产救灾办公室，协调相关事宜。不过，张凯帆所回忆的内涝现象，在当时人们的记录中鲜见踪迹。无为县委的干部们注意到了当时雨雪天气较长的问题，特殊的气候也确实有可能加剧农民御寒的困难<sup>⑤</sup>。但无论是气候严寒还是内涝，都不至于立即造成农民的饥荒，因为1957年1月至5月间，农民食用的是上一年留下的粮食，严重的内涝可以带来农作物减产，但其所导致的粮荒只能发生在1957年5月中下旬开始的午季收获之后，很难造成上半年农民口粮的不足。

1956年，由于无为县委高估了粮食产量，芜湖地委又下达了过高的征购任务，无为县农民实际留用粮食总量仅有29 000万斤原粮。由于一个农民每月实际需要消费的粮食不能少于40斤原粮，根据无为县的农村人口情况，即使包括饲料粮和种子粮在内的留用粮食都被农民充做口粮消费的话，从1956年6月开始消费计算，也仅够维持到1957年1月前后<sup>⑥</sup>。

很明显，干部们真正面对的是农民口粮已经吃完的严重困难。对于这一点，1956年12月28日，县委工作组在基层做典型调查时，就已经说出来了：“由于今年减产，目前已断炊面的发展，愈来愈增大。”<sup>⑦</sup>由于土壤、水利、人口结构、干部等一系列因素，在无为县域内各个生产单位粮食产量、留用量都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断炊面的扩大说明了饥荒正在从条件差的地区向条件好的地区蔓延。

无为县委向芜湖地委紧急求助，全县农民获得了14 000万斤的调拨粮。以此数字计算，1957年5月下旬午季粮登场之前，无为县农民每人每月口粮量可以达到30斤原粮<sup>⑧</sup>。然而地委调拨返销粮的时候打了折扣，只供应了12 671万斤。1957年1月，县委委员、县长周志坚说：“自1956年7月至12月止，已供应各种粮食7385万斤，占地委核定我县计划20 056万斤的36.6%；1957年1至6月份，尚有12 671万斤，比各区统计上报数（15 392万斤）相差2721万斤。”<sup>⑨</sup>县委计划得保守一些，争取能让这

① 曹树基：《知情、回避与服从：1959~1960年的无为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年第3期。

②⑥⑧ 徐进：《粮食与政治：论1956年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施》，《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③ 《中共无为县委关于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电话指示》（1957年2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④ 张凯帆口述：《张凯帆回忆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329、330页。

⑤ 根据无为县县委委员王亨昌在1957年2月10日提交县委的调查报告，群众缺乏燃料的情况相当严重。如在三溪、白马、神塘、万元乡，有60%~70%的群众缺乏烧草，有的甚至烧床铺，烧破烂家具。引自《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1957年2月1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⑦ 《对严桥、严光、平定三个社的检查报告》（1956年12月28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⑧⑨ 《关于进一步做好粮食定销工作的几点意见》（1957年1月27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73。

些粮食供应到6月。不过午季粮一般在5月底就能登场,所以周志坚还是留了话:“今后每月粮票的发放可能提前十天至十五天,也可解决一些问题。”<sup>②</sup>

### 2. 农民断炊情况的出现与扩大

按照人均30斤原粮的标准,少下拨2721万斤就是让无为县农民少了一个月的口粮。这么大的粮食缺口让县委不得不精打细算。1月27日,县长周志坚指责下级干部,不要以为农民需要多少,国家就要给多少,“我们认为是否真正吃过那么多,不仅我们无有把握承认,就是你们自己也无把握”<sup>③</sup>。县委不相信农村的需求量像下级干部说得那么大,希望晚些下发返销粮免得接不上午季粮收获。

1956年12月底至1957年2月,无为县委派出检查组分赴各地调查。这才有了1957年2月9日,县委书记彭醒梦的一番话:“各地灾情具有不同程度的发展……去年收的稻子现在已快吃完也是原因之一。”<sup>④</sup>区社之间的不平衡、生产队内部的差异,让生产没搞好或者征购压力大的地方灾情尤其严重。根据2月9日的一份报告,困难的地方如泥汭区,“二月份全区断炊15354户,67434人,占总人口99116的64%”。而该区的新华社则更为严重,“二月份全社断炊1056户,占全社1127户的93.3%,断炊4737人,占全社总人口5064的93.2%,如十队10户全部断炊,三队谢发双全家11口人……业已断炊”<sup>⑤</sup>。在陡沟区,“周闸社第九队236人就断炊45人,占总人口20%”。而昌坝社“公路队仅有25%的人暂无问题”<sup>⑥</sup>。

无为县部分地区在1956年12月底就已经断粮。县委发放返销粮不及时,使得情况一直在恶化,到了1957年2月初,一些地区的断炊面超过了90%。这样一个长时段、规模性的断粮让无为县许多农民的生存失去了保障<sup>⑦</sup>。无为县1956~1958年农业人口变动情况见表1。

表1 1956~1958年无为县农业人口变动情况

项目		1956年	1957年	1958年
农户		205 251	208 536	205 896
农业人口	合计	888 145	896 093	861 979
	男	467 754	471 379	451 366
	女	420 391	424 714	410 013

资料来源:《解放以来历年农业人口、劳力、耕地情况》,无为县档案馆藏,1-3-1011884。

1956年末即1957年初农业人口为888145人,1957年末农业人口为896093人,那么1957年农业人口增加了7948人。

1957年的全县人口自然增长率和迁入迁出情况见表2。

表2 1956~1957年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

年份	合计	出生	出生率(‰)	死亡	死亡率(‰)	自然增长率(‰)	迁入	迁出	净迁出
1955	940 004	23 041	24.5	14 643	15.6	8.9	12 675	14 480	1805
1956	944 884	23 880	25.3	14 269	15.1	10.2	18 897	23 633	4736
1957	982 979	31 159	32.3	8804	9.1	23.2	17 429	19 849	2420

资料来源: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无为县志》,第106页。

假定1957年无为县农业人口与全县人口的出生率是一致的,那么用1957年初农业人口888145人乘以出生率32.3‰,可得农业人口增长28687人左右。死亡率取三年来的最高值15.6‰,乘以

① 《中共无为县委关于前一阶段工作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电话指示》(1957年2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② 《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1957年3月6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③ 《关于陡沟区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报告》(1957年2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④ 1957年上半年可能出现的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承上海交通大学刘诗古先生提示,特此致谢。

888 145人等于死亡人口13 855人。这一部分死亡人口应该是与饥饿无关的正常死亡。即使 1957 年全县的 2420 人的净迁出全部发生在农村,那么农业人口也应该净增加12 412人(28 687-13 855-2420=12 412)。但是根据表 1 数据计算得出 1957 年农业人口仅增加了 7948 人。因此,1957 年无为县当有非正常死亡四千余人(12 412-7948=4464)。否则,出生率为 32.3‰的数字准确性就出了问题。

### 3. 农民与干部的因应

从 1956 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实践,以及 1957 年年初县委上下对于所谓灾情的讨论中都可以看出,“灾”在各级干部们的口中成为一个符号。他们明知压得农民喘不过气,让基层干部“招架不住”的不是自然灾害,而是农村留粮太少所导致的实实在在的饥饿。有记载称:“干部本身有毛病,站不起身来,目前被缺粮呼声压倒,产生畏难情绪,有的已招架不了。”<sup>①</sup>由于地委下拨的返销粮减少了 2721 万斤,迫使县委严格地卡住粮食分配的时间,担心分得早了接不上午季粮。从 1956 年 12 月底至 1957 年 2 月初,县委派出的检查组里连连上报各地的严重困难,县委终于相信下级干部要求供应的呼声不是跟着农民瞎喊的。2 月 10 日,县委决定拿出一小部分贷款派供销社到黄浦购买粮食。在粮食买回来之前,从尚有节余的农民手中借出一部分以解燃眉之急。县委的说法是买回粮食解决牲畜缺粮问题,但在人已经断粮的情况下,买回来的粮食是救畜命还是救人命是可想而知的<sup>②</sup>。

1957 年 10 月无为县委未雨绸缪,开始布置来年年中才收获的午季粮食的分配,而亲身经历了饥饿的农民们也开始琢磨自保之策。“午季多的队要队保队,午季少的队要统一分配的矛盾没有解决;还有的人口多劳力少,生活困难的要求按人口或按生活情况预支;有的队对分配政策有怀疑,怕不能按多劳多得原则执行。”<sup>③</sup>由于人口结构上的差异,劳动力与消费人口比例占优势的生产队往往更倾向于按照工分多少分配,而一些负担重、人口压力大的生产队则希望社内平衡,统一分配,从其他生产队获得更多的粮食<sup>④</sup>。

部分生产队担心不能按多劳多得原则进行分配是有道理的。在 1957 年上半年的危机中,由于各个区乡、生产队之间的受灾状况有重有轻,县委试图通过余缺调剂应对灾情,一方面开展社内余缺调剂;另一方面开放粮食交易市场。在社内调剂中,那些劳动力少的农户和生产队由于根据工分分配到的粮食少,自然会被纳入补助的重点对象。陡沟区“全区补助 25 000 人,每月需要补款五万多元,因而形成补助款大于工分款”。工分款少于补助款,意味着农民得到的粮食中大部分来自政府救济。补助时值饥饿时期,农民拿到钱以后主要得用来购买返销粮。以每百斤稻子销售价格为 7 元 1 角 5 分计算,5 万元可以买到将近 70 万斤稻子,25 000 人平均获得 28 斤。昌坝社的中心队领款 113 元,其中补助款为 59.50 元,工分款为 59.50 元。113 元一共可以买 1580 余斤稻子<sup>⑤</sup>。由救济面之大可见该队粮食短缺的严重性。县委委员钱增报告说:“一家五口人,一个劳力,连本身养三个人,还有两个人就要补助,这种人就不愿积极生产,因为积极生产,工分钱得多了,怕减少他的补助款。”<sup>⑥</sup>劳动力少的家庭与其多劳动多得工分,不如控制劳动量获得补助。毕竟增加劳动强度和时间需要付出更多辛苦,使得饥饿感更强,粮食需求更大。1957 年上半年过于严峻的粮食紧张形势迫使县委进行大范围的补助,这种应急再分配手段破坏了按劳分配的政策,使得那些人口结构上占优势的生产单位的利益直接受损。这就使得他们以后会更倾向于选择集体瞒产。

过大的补助面所可能带来的危险,县委并非不清楚,“助长了群众依赖政府,而且丧失了群众生产积极性,甚至不愿从事生产”<sup>⑦</sup>。所以,在 1957 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中,为了实现粮食分配相对平衡,

① 《对严桥、严光、平定三个社的检查报告》(1956 年 12 月 28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② 《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1957 年 2 月 10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③ 《三干会议目前工作情况的调查与今后意见》(1957 年 10 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8。

④ 曹树基:《知情、回避与服从:1959~1960 年的无为政治》,《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1 年第 3 期。

⑤ 《关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1957 年 10 月 6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⑥ 《关于陡沟区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报告》(1957 年 2 月 9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⑦ 《关于陡沟区当前几项主要工作的报告》(1957 年 2 月 9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同时又不过多伤害多劳多得的农民利益,县委可谓绞尽脑汁。在社内调剂中,鼓励将下种之后多余的种子和饲料拿出来调剂;而粮食交易市场中,也允许农民以高于统购价甚至统销价的价格卖粮。县委对于农村留粮太少而导致的农民缺粮现象心知肚明,没有发动干部用强力手段挖社会余粮,避免了有粮农民大喊缺粮,从而便于返销粮真正发放到位。

在农村留下的各种可以充作口粮的返销粮、种子、饲料和瓜菜代食品,都成为农民捱过这段粮食紧缺时期的救命粮。不过,1957年上半年无为县的粮食危机和农民自救,在各级干部的口中被述说成了应对雪灾亦或涝灾的问题。县委深知粮食征购才是饥饿的真正原因,但仍需要将救灾作为套话。文件中的口号与实践中的应对俨然有各自的逻辑。5月下旬,午季粮就要登场了。经过了几个月的紧张之后,面对又一次收获与征购,无为县委的干部们如何抉择,农民又如何应对,成为了摆在他们各自面前的首要问题。

### 三 危机之后审慎的统购统销实践

#### 1. 1957年夏季县委、地委、省委的互动

1957年6月4日,无为县委第一次讨论了午季分配问题,决定在6月份销售粮食2500万斤,7月份销售2893万斤,合计达到5393万斤<sup>①</sup>。这个计划包括城乡两方面的人口。但几天之后,这个计划却被芜湖地委驳回了。地委要求无为县6月份只能销售2080万斤,七月份则为3093万斤,合计5173万斤<sup>②</sup>。显然,地委给销售计划打了折扣,试图迫使县委把城乡口粮量压得更紧。7月10日,无为县委对6月份的销售计划作了总结,其中提到:“自6月1日到7月5日计销售各种粮食2945万斤……平均每日销售84万斤,其中农村供应2390万斤。”<sup>③</sup>减去7月1日至7月5日销售的420万斤(84万斤/每天乘以5天等于420万斤),6月销售的粮食达到2525万斤。

7月10日,县长周志坚提及从6月1日至7月5日,“供应面积占农村人口57.8%”<sup>④</sup>。1957年年中,农村人口大约为885448人。在6月份,大约占据农村人口57.8%的农民,即约511789人接受了2041万斤的粮食供应,可知人均大约获得40斤原粮。当然,由周志坚讲话所推算出的人均口粮量并没有将可能存在的下级干部截留、克扣的数量剔除出去。除了6月份,7月份的口粮安排也是一并纳入午季收获的供应面里的。因为7月中旬是早稻登场的时间,算上早稻收获和分配需要时日,午季粮吃到7月份的安排是合理的。

按照统购统销政策规定,农民一年所获得的粮食应该是490斤原粮,即每月40斤左右。在统购统销的实践中,执行保证农民足额留粮的政策与完成粮食征购、控制粮食销售的任务常常存在矛盾。这一次,无为县委顶住了芜湖地委压缩销售量的压力,坚持了6个月销售2500万斤的自定计划,使得无为县的农民在这个月里人均获得了40斤口粮。

更让人惊讶的是,县委打算在7月份的人均留粮指标也不低。7月12日的工作意见书上出现了这样一句话,现在读起来,仍然能感到说话人颇为轻松又略有些得意的味道:“恢复到1956年5月份定量标准,现在够吃了,平均每人每月定量27.9斤。”<sup>⑤</sup>这里的27.9斤应该是成品粮,折合原粮37.2斤。

无为县委如此操作的原因是芜湖地委在原计划于6~7月销售5173万斤基础上,追加了628万斤,达到5801万斤,比县委以前的计划更宽裕了<sup>⑥</sup>。这一次追加记载于7月10日的县委会议记录,成为了无为县农民能够每月人均获得40斤原粮的关键一环。

对于芜湖地委行为的合理解释,则是它承受了来自更高层的压力,即安徽省委授意地委妥善处理无为县的粮食供应问题。6月19日,无为县委讨论了安徽省委就人民来信问题下达的指示,省委要

①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6月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②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6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③④⑤⑦ 《常委办公会议记录》(1957年7月1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⑥ 《1957年上半年度粮食工作情况及今后工作意见》(1957年7月12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1-1957-095。

求注意蜀山闹粮的事件。当天的会议记录中记载：“蜀山区为粮食事情有很多人到乡到区，各区要抓紧时间做好粮食工作。”<sup>①</sup>蜀山闹粮已经让省委知晓，可见事情不小。考虑到人民来信到达省委需要时间，省委处理审查和交代相关信息到县委也需要耽搁几天，蜀山闹粮的人民来信反映的仍然可能是1957年上半年午季收获之前的粮食紧缺。省委高层领导张凯帆、曾希圣曾经接连来到无为县视察灾情，已经了解到了无为农村的困难，甚至可能已经知道了无为县农民有饿死的情况，省委便指示地委要妥善处理无为粮食销售问题。在无为县的档案材料中，芜湖地委追加600多万斤的粮食销售指标的事情，是在7月10日的县委会议上首次被记录在案的。从时间上看，省委接收人民来信在前，地委增加指标在后，因果联系也说得通。

在县委与地委的讨价还价中，地委打折扣地批准县委的粮食销售计划往往是常态性的。然而这一回，来自省委的压力迫使地委在压低县委指标之后又重新增加，三个层级的互动体现了地方粮食政治的复杂和微妙。

不过，无为县委现在面对的是刚刚从大范围断粮的困境中走出来的噤若寒蝉的农民，瞒产私分的蔓延和发展已经开始让县委头疼。1957年6月9日，周志坚在县委会议上忧心忡忡：“粮食工作变化也认识不足……现在是分配，社内群众说没有，社内就没有，同时有的报了产量，也有的社集体瞒产，过去闹粮食是个体户，现在闹粮食是集体的。”<sup>②</sup>遭受了口粮紧缺的打击后，不仅是农民，甚至是基层干部对于统购统销的信心也已经十分脆弱了。午季粮登场接近两个月了，周志坚还在要求农工部去摸清产量，“午季产量究竟多少，到现在未搞清”。在这天的常委会上，各区书记在会议之前上报的产量是2800多万斤，会议结束时涨到3300万斤<sup>③</sup>。按照每人每月40斤原粮的标准，无为县的农民六、七两个月需要7084万斤。粮食销售指标只有5081万斤，所以午季收获的粮食中有1283万斤被留在农村满足农民吃粮。各区的书记已经预计到了高征购会让留用粮不够吃，重蹈1956年的覆辙。因此，农民和干部合谋瞒产并不奇怪。襄安区就有社员反映490斤不够吃，并因此瞒产<sup>④</sup>。瞒产私分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有可能让原本一本糊涂账的粮食统一分配更加扑朔迷离。用无为县委干部的话来说：“不相应地制止瞒产私分，就不可能实行统一分配。”<sup>⑤</sup>正是由于瞒产私分存在，县委难以真正知晓各区、社实际的粮食产量、存量有多少，而瞒产私分带来的上下级之间的彼此试探和互不信任也加大了协商沟通的成本。

## 2. 1957年下半年老县委与统购统销的实施

在1957年上半年的安徽省，无为县的粮食紧张也许并不是个案。1957年年中安徽省委就鉴于下级干部反映农业税负重，要求重新核定各县人口和产量，重新修订农业税数字。当时的安徽省委领导曾希圣讲道：“为什么说要调查产量？产量和负担联系在一起，有人说百分之五十、六十和七十都不可以。这个是以三定产量为基础，确定产量来计算税负。现在有变化了，必须重新把人口、产量搞清楚，再逐级上报。然后进行修订。过去虽然搞了，也没彻底。”在这一背景下无为县委经过重新调查，向芜湖地委汇报该年预计粮食总产量60300万斤。这一数字大大低于1955年无为县三定常产84797万斤<sup>⑥</sup>。这一数字是否更接近实际呢？据档案可知，无为县正常年景粮食亩产约为300斤，1957年种植面积大约220多万亩，由此可知粮食总产量大约66000多万斤<sup>⑦</sup>。按照《无为县志》的说法，1957年的粮食产量为63000万斤，与66000多万斤的推算相近。无为县委把粮食产量稍稍低报了一些。

芜湖地委并不同意无为县委汇报的60300万斤的粮食总产量，他们在1955年无为县三定常产

① 《县委全体扩大会议》(1957年6月1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②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6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③ 《常委办公会议记录》(1957年7月1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④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7月22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⑤ 《关于如何做好秋季分配工作的意见(草稿)》(1957年7月7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90。

⑥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7月2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⑦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106页。

84 797万斤基础上,以八三折即83%计,得出无为县1957年粮食产量70 381万斤<sup>①</sup>。这给无为县委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在1957年8月19日的县委会议上,分管粮食工作的县委委员白肇义就说经过产量预测,无为县征购任务应该只有31 700万斤,可是地委却下达了35 000万斤的征购任务,两者相差3000余万斤。县长周志坚解释说,县委在7月份接到了35 000万斤的任务以后,“以31 700万斤上报过数次,地委未表示态度”。虽然地委不更改原定指标,但是周志坚也不打算按地委的征购任务执行:“我们现在按31 700万斤征购任务下放,实际上在无为对31 700万斤的征购任务是完成不了的,即使是全区丰收年,征购任务只完成27 000万斤,根据这一情况,今年征购任务完成25 000万斤就是好事。”周志坚打算继续同地委讨价还价:“今年六月在地委粮食工作会议听周专员讲话的口气,对我县粮食征购任务可能要减少的。另外我们再给地委提一意见,请求减少征购任务,是否请大家商量。因为31 700万斤,是纯征购任务,如果包括调剂粮在内那倒好办了。”<sup>②</sup>调剂粮在收获后会被征购到县里但不会调运出境,如果农民口粮不足,就可以作为返销粮下拨。

周志坚要顶住地委的压力,严格控制住粮食征购量,但是副县长、农工部部长朱吉祥却另有看法。他援引《人民日报》社论,强调:“产量如何研究恰当,这是要好好研究的,《人民日报》发表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的社论,反对两个主义,因此我们要实事求是。”<sup>③</sup>这篇社论登于8月5日,认为国家粮食丰收,征购量却在减少,“农村中滋长了个人主义和本位主义。只要加强了思想教育,粮食征购数目就可以大为增加”<sup>④</sup>。朱吉祥所言的“实事求是”,其实就是多挖粮、多征购。查阅1957年《人民日报》关于粮食问题的文章,有大量反对瞒产、保障国家征购任务完成的内容。一位姓名不明的部长和朱吉祥意见一致,也要求按照地委指示的35 000万斤指标向下布置。他们还给出了具体的根据,那就是不相信地委最终能降低征购任务,如果自己先调低了安排,以后会工作被动<sup>⑤</sup>。

无为县委大多数成员没有接受朱吉祥等人的意见,而是决定把征购任务“减少至2900万斤至3000万斤”,在省委四级干部会议上向省委、地委请示<sup>⑥</sup>。不过这一次地委并没有给无为减轻任务。9月28日的一份粮油统购统销工作意见称,地委分配了征购任务36 500万斤,其中包括调剂粮2503万斤,纯征购任务33 997万斤。调剂粮是留在县内的,因此县委要上交的粮食为33 997万斤<sup>⑦</sup>。这份计划是地委参考1955年无为县粮食产量下达的。1954年的长江特大洪水使得全县粮食几乎绝收,土壤肥力提高,1955年获得特大丰收,粮食产量高达77 000万斤<sup>⑧</sup>。参考1955年的极端数据来制定1957年的计划显然是不合适的。

10月6日,县委书记处书记朱合启在三级干部会议总结时承认:“我们粮食统购中是有缺点的,如收购有时买了过头粮,个别地方产生强迫命令的现象。”强迫命令、过头粮都是为高征购任务所迫。因此有人反映:“统购任务控制过紧,实产达不到常产和包产,农民要背产,吃不到490斤口粮。”<sup>⑨</sup>按照63 000万斤的总产量计算,如果征购任务为33 997万斤,那么无为县只能留下29 003万斤。在1957年10月的算账中,县委估计种子、饲料人均需要40斤。如果这个估值可信,那么无为农民(885 448人)所能获得的人均口粮仅为288斤左右。这些粮食至少得要撑到来年午季收获。因为63 000万斤的收获量包括了午季产量在内,所以从1957年5月底到1958年5月底,还有一年的时间。至于最终农民到底能留下多少,就得看征购任务的完成情况和返销粮的数量了。但是朱合启拿出了一个浮夸的85 655万斤的产量,以包括在调剂粮在内的36 500万斤征购任务,算出农民每人能留下512.5斤的口粮<sup>⑩</sup>。按他的说法,足额完成征购任务,而且不需要发给返销粮,农民仍然够吃。

朱合启的这套算法对于了解实情的基层干部们并没有说服力。用泥汊区前进社支书记肖尚喜的话来说:“政府今年征购粮食,只顾任务,不顾政策。巧价买进,贵价卖出。”新民区饲山社张子南大

①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7月2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②③⑤⑥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8月1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④ 《粮食问题和思想问题》,《人民日报》,1957年8月5日,第1版。

⑦ 《1957年粮油统购统销工作意见》(1957年9月28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72。

⑧ 徐进:《粮食与政治:论1956年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施》,《开放时代》2012年第7期。

⑨⑩ 《关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1957年10月6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为不满,引用群众的话说:“政府现在实行三光政策,稻光、仓光、草光。”<sup>①</sup>不仅仅粮食是征购的对象,饲草、稻草也为上级政府所需要。

县委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不久的10月11日,粮食局汇报截至10月4日入库粮食28 070万斤,占全年征购任务的76.9%。全年的征购任务是包括调剂粮在内的36 500万斤。完成情况可以说是相当不错了,与去年同期比较增加3354万斤,与粮食大丰收的1955年同期比也增加3.51%,大大超过了周志坚等设想的25 000万斤,可粮食局还是认为问题多多,因为,全县还有8000多万斤粮食没有入库<sup>②</sup>。

1957年午季收获以来,无为县的农民一度摆脱了每月人均口粮不足30斤原粮的困难局面。同样经历了粮食危机的无为县委也吸取了教训,在同芜湖地委就粮食征购任务和销售指标的讨价还价中也显得更积极努力。安徽省委在了解到无为县的困难之后,向地委施加压力,通过追加粮食销售指标使得无为县的农民在6~7月份里能吃上统购统销政策所承诺的每月人均40斤的口粮。这一事件给县委留下了深刻印象,在秋收分配再次遭遇地委高征购任务的沉重压力时,希仍能获得省委的支持,改变自己的不利处境。然而这次努力失败了,当县委必须按照虚高的粮食产量布置征购任务时,各级基层干部和农民开始抵制县委的做法。

#### 四 新一轮饥饿的出现

##### 1. 新书记姚奎甲的到来

1957年年底,时任任芜湖地委书记处书记和桐城县县委书记的外地干部姚奎甲担任无为县县委书记。姚奎甲在无为上任之后,便改变了县委过去同上级在粮食征购上讨价还价的做法,更坚定地执行上级下达的任务。

曾希圣在无为县完成视察后回到省里,告诉张凯帆说:“灾荒确实很重。无为县委书记彭醒梦好像不能胜任。”张凯帆说情:“彭还是有能力的,也深入下层,他见你,因为闹灾,工作没做好,你问问题他也不敢回答。现在许多人见你害怕呢。”曾希圣并不买账:“我见他时并没有发脾气呀。无为是革命老区,工作要有起色,得换人。”这时,桂林栖推荐了姚奎甲,说他“有魄力,有能力”<sup>③</sup>。姚奎甲是桂林栖的老战友。1945年10月,中共皖西工作委员会成立,桂林栖任皖西工委书记<sup>④</sup>。1947年皖西工委整编皖西支队,姚奎甲任支队直属队教导员<sup>⑤</sup>。

姚奎甲上任伊始,粮食工作就是留任的无为县委干部们向他汇报的主题之一。白肇义汇报:“粮食征购任务有些过大,产量开始估计过高,没有那么多……有些地区少数群众在闹供应……确实缺口粮,但也有的由于瞒产私分。”<sup>⑥</sup>会议后的第二天,无为县委接到芜湖地委的指示:“粮食征购任务完成进度很慢,要把这一工作抓起来,要尽快完成任务。”县委向地委上报的产量已经高达77 000万斤,地委还是不同意,要求重新讨论。地委方面给的压力不减轻,县委只能转而向下面的各区施压了。各区报来的69 000万斤的产量,县委认为产量太少,与他们上次报的产量相差太远,让他们动员党团员,对产量进行摸底。可是县委自己很清楚:“我们向地委报的77 000万斤有些偏高,按照各区报的产量和财贸部摸底的材料,77 000万斤已是达不到的。”可是在明知达不到的情况下,县委还是决定:“现在不管怎么样我们向地委报77 000万斤。”无为县委曾经给地委上报60 300万斤的预计产量,但是地委要求达到70 381万斤。可是现在即便县委增加到77 000万斤,也不能再满足地委的要求了。粮食产量的一再加码,意味着征购任务也是居高不下。眼看着产量上已经很难再降低了,县委决定:“统销问题要向上报,不然卖过头粮和缺粮户不能解决。”<sup>⑦</sup>

① 《三级干部会议情况汇报》(1957年10月9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② 《对第一阶段粮食征购和收贷工作检查和今后工作的意见》(1957年10月11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72。

③ 张凯帆口述:《张凯帆回忆录》,第330页。

④ 中共舒城县委党史办公室编:《舒城革命斗争大事记》,安徽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13页。

⑤ 中共安庆市委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安庆地方史》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1年版,第393页。

⑥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1月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5。

⑦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1月5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5。

新任县委书记姚奎甲并没有站在县委的立场上同地委讨价还价,而是打算坚定地执行上级下达任务,从而把地委的压力直接带入了无为县委之中。1957年11月8日,芜湖地委批评无为县瞒产现象是“普遍严重的”,指示要针对瞒产行为作斗争,粮食产量不能比别的县的低。姚奎甲明确地支持了地委的指示,1957年无为县的反瞒产肇始<sup>①</sup>。十天之后,粮食局的一份工作报告显示,粮食征购已经入库29 148万多斤,占任务的80%,而代价是“个别地区出现了少数群众闹粮食供应问题的不正常现象”<sup>②</sup>。姚奎甲的态度很坚决:“还是以77 000万斤核定下来,地委征购任务36 500万任务还是要完成的。”<sup>③</sup>

时间拖到了12月。这月4日的县委会议记录记载了芜湖地委的批评:“各地产量不真实,如无为周闸王中等社瞒产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五;十二月十五日要把产量核实,最后一次了,不要再变了。”虽然地委非常希望把瞒产的粮食挖出来,但是上下级认定的产量碰不起头来,迟迟定不了案,到底是让地委等不及了。宣城、无为都属于芜湖专区完成任务较差的地区,为了尽快落实工作,地委决定:“任务还要减一减。”调整后,无为县的纯征购任务为29 497万斤,另外调剂粮2503万斤,合计32 000万斤<sup>④</sup>。

可是即便任务减轻,到了12月下旬,“有的区、乡至今粮食产量到底多少还不能定案”。截止12月20日已经入库粮食30 300万斤,离地委调整后的征购任务尚差1700万斤。因为粮食产量与征购任务相关,高征购任务必须用高产量来解释。一些地方对于县委分配给自己的征购任务还不能接受,不愿意按照过高的产量虚报。无为县的农民也非常清楚高征购的结果,“以致个别地区发生有少数群众不生产跑到乡、社委闹粮的现象”。一个月前,姚奎甲在转发蜀山区调查报告时用到的官僚主义、右倾保守的话语,反应到了白肇义在12月23日的讲话里:“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官僚主义作风,不了解情况,对粮食产量心中无底;另一方面是由于有些领导干部的右倾思想,决心不大,一听到富裕农民的片面叫苦,不很好的分析,思想就产生了动摇,这实质上就是资本主义思想尚未彻底肃清。”<sup>⑤</sup>

1957年11月姚奎甲来到无为县,随即带来政治动荡,无为县原县委书记、时任书记处第二书记彭醒梦去职,同时去职的还有书记处书记钱增、县委常委陈作霖<sup>⑥</sup>。钱增曾在1957年年初的粮食危机中赴各地调查,向县委汇报农村紧张形势。他了解高征购会给农村带来怎样的伤害。以姚奎甲为核心的无为县委抱定瞒产私分严重的观念,认为农村的不稳定是因为富裕农民的片面叫苦,因此告诫下级干部,不能遇到闹粮问题就跟着假叫的群众向上叫、向上要,达不到要求就不加分析地埋怨上级<sup>⑦</sup>。

无为县委深信瞒产私分存在,与芜湖地委的认识不无关系。12月23日,白肇义发言的背景是地委工作组的一份报告被批转各地。地委工作组在无为县刘渡乡联合社做粮食问题的典型调查,发现“群众普遍叫喊减产,余粮卖过头,没有吃,有的人甚至要求供应”。但是检查组不相信这是实情,反而指责乡社干部“被群众叫喊所迷惑,领导上产生右倾思想,在粮食分配上未控制住”<sup>⑧</sup>。联系到早在11月8日,芜湖地委就警告过无为县委注意解决严重的瞒产问题,可见瞒产私分在农村普遍、严重存在是芜湖地委的既有观念<sup>⑨</sup>。地委检查组的报告得到了县委书记处书记兼县长施惠之的赞赏,批转各地学习。施惠之12月刚到无为县任职,原为芜湖地委财贸部副部长,同姚奎甲一样,在粮食工作上秉持的是地委的态度。1963年,姚奎甲做检讨时委屈地说:“五八年前就有问题。我到无为后,省、地

①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1月8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② 《关于粮食统购统销工作几点意见(初稿)》(1957年11月18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1-1955-063。

③ 《县委常委会议记录》(1957年11月2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096。

④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2月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⑤⑦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2月23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⑥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338页。

⑧ 《无为县刘渡乡联合社的粮食问题》(1957年12月23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8。

⑨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1月8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委工作组常住无为帮助工作,有些重大的问题都是根据当时省委曾庆梅书记的指示做的,所发生的问题他都知道。”<sup>①</sup>姚奎甲做这番表述目的是为自己辩护,但也透露出他调任无为后的各项举措都得到了省委、地委的支持或默许。

## 2. 新老县委关于种植双季稻问题的分歧

就在姚奎甲强力推行高征购的同时,11月20日,无为县的三级干部会议结束了。此次三级会议先让干部们就粮食工作展开鸣放和辩论,之后对那些立场不坚定的干部进行批判教育。基层干部们除了反映口粮不够吃,还指责了县委再一次大力推广双季稻的做法。

1956年无为县的农业茬口安排发生了改变,中稻的种植面积减少,双季稻面积增加。这一改变是在安徽省农业改制的大背景下发生的<sup>②</sup>。省委书记曾希圣是农业改制的主要提倡者。1953年9月,曾希圣根据自己治理淮河的经验,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提出对安徽农业进行“三改”——改变夏秋收成比重,扩大夏季作物面积;改种耐水作物和高产作物;改变广种薄收的耕作习惯,实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的主张。双季稻种植面积的扩大虽然增加了耕地的复种指数,但是却打乱了农村既有的劳力、肥料等资源的安排方式。

1956年无为的粮食减产就与双季稻有关。在1957年的这次三级干部会议上,大多数基层干部都主张:“五六年受灾是人为的,就是三改80%干错了。”1956年双季稻种植带来了粮食减产,进而造成了1957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姚奎甲来到无为后,紧跟曾希圣的“三改”方针,要在1958年重新扩大双季稻种植,自然引起已经吃过亏的基层干部的不满。用襄安区爱过社主任李少松的牢骚不满话来说:“人民政府搞的乱七八糟,动不动就开刀……上面领导有坏分子。”新民区管镇乡的一名组织委员讲得更加明确:“三改干坏了是因为曾政委是奸臣。”<sup>③</sup>然而,反对扩种双季稻的干部被打成了右派,“三改”继续在无为进行。

相对于姚奎甲,彭醒梦主政的无为县委处理基层干部对双季稻的抵制时,显得更加宽容。1957年2月,下到基层视察的王亨昌向县委汇报泥汭区的双季稻种植情况:“有的只订20%以上,有的只订10%以上,没有根据土质、劳力、牛力等条件来安排。在订计划中缺乏领导,放任自流,随群众要订多少就多少。党团支部有些右的情绪,在发动社员自下而上讨论计划中,党团员干部不发表意见,也不领导。”<sup>④</sup>可见农民减少双季稻种植的做法,是干部与农民的合谋。曾希圣指示1957年双季稻种植面积可以有20%~50%的幅度。作为双季稻的提倡者,他当然希望种得越多越好,但县委却把20%的底数告诉了泥汭区委,区委便纵容农民抓住这个最低数字来订计划<sup>⑤</sup>。

三级干部会议结束后,姚奎甲趁胜追击,又召开了区委书记会议,提出为了不走弯路,要尽快安排1958年生产:“五八年农业生产任务为什么现在就要提呢?理由很简单,你们回去整社,第四阶段就要安排生产,订五八年计划,没有任务怎么安排呢?就是安排了也和原来一样。”为了达到1958年113009万斤的惊人产量,姚奎甲强调:“特别的问题就是双季稻和单位面积产量,这是个普遍的问题。”<sup>⑥</sup>

为了巩固区委书记会议上为双季稻种植做思想工作的成果,姚奎甲将蜀山区作为典型进行批评,警示其他县委和基层干部。无为县委分配蜀山区的秋种计划是10万余亩,但是在11月2日与该区负责干部电话联系时,发现蜀山区只打算种植8万亩左右,理由是没有田地能再多种了。县委随即派出检查组赴蜀山区调查,发现实际只种了5万多亩<sup>⑦</sup>。检查组的调查报告分析了蜀山区干部和农民不愿意足额完成秋种计划的原因:一是土地肥力、肥料等因素的限制使得社员相信,种下了徒劳无益

① 《我的检讨》(1963年10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63-322。

② 刘诗古:《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学术界》2012年第4期。

③④ 《关于召开二十二次三干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1957年10月21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⑤ 《给彭、朱部长并县委同志的报告》(1957年2月15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⑥ 《姚政委在区书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0月22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90。

⑦ 《中共无为县委批转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生产工作的调查报告》(1957年11月3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还耽误了工,即使有些收益,大量耗费肥力和蓄下的雨水又会影晌来年的收获;二是劳动力的不足。正该播种双季早稻时,有的生产队仍忙于抢收双季晚稻,来不及完成种植任务<sup>①</sup>。

无为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的调查报告还是相当中肯的,分析了双季稻种植完成情况较差的原因。土壤、降水条件,劳动力状况都是客观上制约双季稻种植的因素。然而县委转发这份报告时加上了一段严厉的批评意见:“从部分干部到群众都有右倾保守思想……某些领导同志作风不够深入,仍以官僚主义的态度领导生产,因而在电话上向县委汇报一些不切实际的情况。”<sup>②</sup>不难猜测,所谓的县委意见,就是主张推广双季稻种植的姚奎甲的意见。

县委检查组明知自己是在蜀山区没有完成任务引起姚奎甲不满的情况下前往调查,形成的报告却似乎在为蜀山区辩护。检查组具体成员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都是县委的干部们,他们对于姚奎甲紧跟曾希圣推广双季稻的做法不以为然。姚奎甲知道自己面对着来自各级干部的广泛的怀疑,相信蜀山区的抵制不会是个案,“希望蜀山区委和其他地区党委立即通过检查,采取措施,积极补救”<sup>③</sup>。

1957年年初的粮食危机,让无为县的干部们普遍意识到1956年的双季稻大量种植是“左”倾表现,“有人说,县委领导生产改革,五六年‘左’了”。但是即将到来的农业生产“大跃进”帮了姚奎甲的忙,用郝达民的话说:“我们不能因此就得出结论,说五六年干‘左’了。如果说五六年‘左’了,那么五八年农业生产要来一个全面‘大跃进’,这又怎样解释呢?问题很清楚,这种论断,实质上就是这些同志,自己还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即将到来的生产‘大跃进’中犹豫动摇。”<sup>④</sup>

### 3. 姚奎甲对老县委的整肃

一大批县委干部在1958年1月的干部撤换中被解职。罪名是三不纯,即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姚奎甲曾经检讨道:“错误地攻击前届县委严重不纯,原县委书记白肇义、王亨昌、郝达民及其他县委委员等十余人均先后受到批判处分和调出无为,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sup>⑤</sup>王亨昌和钱增一样,都曾经在1957年年初赴基层调查粮食危机。除了在粮食问题上有照顾地方的“不光彩”历史,这些人都比姚奎甲更早在无为任职,属于留任的县委干部。姚奎甲有意地将留任干部们清洗出去,这才有了所谓的“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姚奎甲清洗留任干部的意图,源自他对无为县委宗派主义的深深忧虑。一旦他遭到反对,很容易就理解为这是无为县的本地干部们对他这个外地干部的排斥。姚奎甲曾回忆道:“我由安庆调到无为,开始是不愿来的,听到一些同志反映无为县大,问题多,工作难搞,又是老根据地,思想顾虑重重,这首先给无为问题的错误看法,奠定了思想基础。”<sup>⑥</sup>姚奎甲曾经问副县长刘希文:“你是否认为县委书记都是外县人,你有没有这种想法?”姚奎甲还警告道:“桐城县有个副书记,就是有这种思想,划为右派。”<sup>⑦</sup>张凯帆曾于1940年代在皖中行署任副主任,彭醒梦则先后任恍城区、银屏区和新民区区长,直接在张凯帆的领导下工作<sup>⑧</sup>。甚至省委书记曾希圣都因为其夫人的关系,视无为县为第二故乡<sup>⑨</sup>。各方力量在此盘根错节,难免姚奎甲对来无为工作忧心忡忡,他担心自己外地人的身份会得不到本地干部的认可。经过了姚奎甲对无为县的本地干部的清洗,1959年张凯帆来到无为后发现“无为书记处没有一个无为人”<sup>⑩</sup>。

在12月30日的县委扩大会议上,政法干部被专门划出批判:“在政法工作方面,大家提出,县委仍然有严重的右倾思想——对政法部门领导不力,抓得不紧,甚至迁就和纵容他们的右倾行为。正由于县委这种思想在指导,因而对地、富、反、坏分子破坏活动,打击不坚决、不彻底、不及时。”无为县法

①②③ 《中共无为县委批转县委检查组关于蜀山区生产工作的调查报告》(1957年11月3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67。

④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1957年12月3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73。

⑤ 《我的检讨》(1963年10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63-322。

⑥ 《县委关于姚奎甲同志在县委会上所作的自我检查材料》(1961年1月14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61-247。

⑦⑩ 《县委扩大会议简报》(1959年9月25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9-167。

⑧ 彭醒梦:《张恺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铁骨丹心:张恺帆同志纪念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4~205页。

⑨ 张凯帆口述:《张凯帆回忆录》,第330页。

院院长林焕章(山东省楼县)、公安局局长王锡文(江苏省泗洪县人)都是军人出身,他们引起姚奎甲的不满可能就与转业军人身份相关。邾达民说:“在整编工作上,有人说:留了地主、富农的子女,整掉转业军人就是不对。我看还是要根据国家政策和每个人的具体情况来决定是非。比如转业军人,就不能说个个都能胜任,没有一个应该整编。”<sup>①</sup>军人转业的政法干部仍然与军方有密切的个人联系,这种关系让他们面对惯于用高压手段打击异己的县委书记时,敢于挑战权威。以王锡文为例,他在1958年12月被打倒后被揭发“反对县委指示,骄傲自满,看不起县委张云书记和骂周县长”。王锡文曾宣称要把县委书记处书记张云抓到军分区找司令员评理。张云于1958年5月任职,属于原县委留任干部中被姚奎甲大撤大换后的新晋干部。王锡文对张云不以为然,也就是间接地反对姚奎甲。对于姚奎甲操作的反右派运动,王锡文也颇有微词:“部队如像行政这样反右派,那全部是右派。”<sup>②</sup>

12月底的这次会议上,邾达民发言中明确讲:“县委表示,不仅要坚决克服在领导政法工作上的右倾思想,而且要马上着手于整顿政法队伍。”<sup>③</sup>不过林焕章、王锡文被打倒的时间却在一年之后的大炼钢铁时期。可见,这时姚奎甲虽然可以将“县委成员几乎换了班子”,但是要整肃有着军队老领导支持的政法系统干部显然更加困难。林、王的去职是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他们二人被打倒的理由,一个是“对党的全党全国人民大炼钢铁的方针,极端抵触”,一个是“担任无为炼铁团副政委工作期间,消极畏难,贪图安逸,临阵退缩”<sup>④</sup>。姚奎甲在这时整肃法院院长和公安局局长,或与他注意控制监察系统相关,尤其是当他的高征购、反瞒产给农村社会带来动荡和混乱时,他必须切断消息走漏的渠道。例如1958年3月,姚奎甲“(根据曾庆梅同志的指示)亲自布置公安局、邮电局负责同志说:今后凡是有人向中央负责同志写信,你们要将信扣下来送县委办公室,并叫邮电部门对各地邮电所也要布置一下”<sup>⑤</sup>。

#### 4. 老县委的“红利”:1958年粮食年度的平稳结束

无为县委的各级干部在应对1957年上半年的粮食危机中,积累了经验,但是他们普遍遭到了姚奎甲的排挤和打击,结果是从1957年年底开始,无为县的农民又处在断粮的恐惧之中。就像1959年无为县委回忆的那样,“1957年11月份农村就在全面闹粮、叫粮”<sup>⑥</sup>。按照笔者之前的计算,1957年无为县收获量大约为63000万斤,征购任务完成30596万斤,占32000万斤任务的95.61%<sup>⑦</sup>。这样算来无为县的留用粮为32404万斤,人均约得到366斤原粮,刨去人均需要种子、饲料40斤,每人可得326斤口粮<sup>⑧</sup>。因为午季收获以后,农民也是按照每月40斤口粮的标准在消费,所以这批口粮只够消费8个多月。农民吃到1958年1月底就要断粮了,离1958年午季收获还有4个多月。由此可见,农民在1957年11月份就开始闹粮,是基于粮食很快就会用尽的理性判断。在30596万斤征购粮中有2500万斤是调剂粮,调剂粮任务是全部完成的。这2500万斤在12月底就已经安排好分配给各地区的比例<sup>⑨</sup>。但是直到来年3月才把这批粮食发下去。当时省委书记曾希圣批评无为县委忽视了严重的农民外流问题,指示把机动粮全部发下去<sup>⑩</sup>。根据1959年的会议记录,1958年1月至5月县委总计下发了6799万斤返销粮,人均约获得77斤原粮<sup>⑪</sup>。另外,1957年6、7月份销售了5801万斤,加在

①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1957年12月3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73。

② 《王锡文的错误材料》(1958年12月1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112。

③ 《关于在讨论中对县委提出的右倾保守思想几个问题的综合发言》(1957年12月30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2-1957-073。

④ 《中共无为县委关于撤销林焕章党内外一切职务处分的决定》(1958年12月16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112;《王锡文的错误材料》(1958年12月1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112。

⑤ 《我的检讨》(1963年10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63-322。

⑥ 《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2月17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9-138。

⑦ 《县委会议记录》(1958年7月22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1-1959-125。

⑧ 《关于县委三级干部会议总结》(1957年10月6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⑨ 《县委会议记录》(1957年12月23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957-085。

⑩ 《县委会议记录》(1958年3月),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104。

⑪③ 《县委会议记录》(1959年2月17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9-138。

一起人均可以获得销售粮 139 斤。人均口粮总量为 465 斤。

1958 年 1 月 3 日,县委书记姚奎甲指示农村春节前一般不供应(当年的春节在 2 月 17 日),分配的调剂粮,主要用于春耕大生产<sup>①</sup>。不过从 1959 年县委会议记录来看,1958 年 1 月其实就已经供应了 259 万斤作为口粮<sup>②</sup>。但这数量很少。所以在 1958 年春节之前,农民吃的基本上还是秋收之后留下来的粮食,之后才开始大量食用返销粮。假定在 1958 年春节(2 月 17 日)之前,无为县的农民人均月消费口粮 40 斤,这样就消耗掉 380 斤,人均剩下 85 斤(465 斤-380 斤=85 斤)。如果在春节之后口粮消费能够有意识地被节制,人均每月口粮量被控制在 30 斤左右的话,85 斤还能够保证多坚持 3 个月,撑到 5 月份中下旬午季粮登场。

为了保证农民消费得到严格控制,1958 年 3 月中旬,无为县初步建立起了食堂系统<sup>③</sup>。“农村粮食安排,除泥汭(部分大队)、神塘、新民三个公社 24 个大队 527 个食堂正在安排尚未结束外,其余 28 个公社 255 个大队 4318 个食堂 759 761 人均已安排结束。”平均下来,一个大队有十几个食堂,每个食堂覆盖 176 人。“在安排方法上,一般是根据现有口粮及社会潜力情况,按照人口多少逐级计算分配指标到食堂,交给群众讨论通过,然后以食堂为单位发给购粮证一次核定分月购粮。食堂则根据分等定量标准定量到人,按期发给饭票凭票吃饭。”“安排的情况一般都是每人每月原粮 30 斤至 32 斤,少数有达 36 斤至 40 斤。”<sup>④</sup>

因为地区不平衡,不同的生产单位留粮有多有少。虽然在绝对平均分配的情况下,无为县的农民都可以支撑到午季粮登场,但是实际上一些条件差的地区会更早遇到困难。如粮食局在 1958 年 4 月中旬汇报:“石涧、汤沟、蜀山等区部分社 5 月份下半月如果午季粮登场迟还有问题。”不过粮食局提供的数据已经是虚假的了。“石涧区 5 月份供应人口 64 376 人安排粮食 1 602 572 斤,每人平均 24.8 斤,按标准计算吃到五月十八日,汤沟区板桥 5 月份安排 44 万斤,供应人口 18 997 人,每人平均 23 斤。”<sup>⑤</sup>即使是这些可能要出问题的区,按照 18 天 23、24 斤的标准计算,一个月的口粮量还可以达到 40 斤左右,这显然是不成立的。粮食局的数据不确。1958 年 8 月,粮食局在回顾之前工作时说:“由于五月份粮食安排偏紧,群众挖吃了一部分新粮。”<sup>⑥</sup>粮食紧张已经发展到吃青的程度,农民的饥饿可想而知。

从 1957 年年底开始,无为县农民喊粮、闹粮就很厉害,但是在这之前他们毕竟曾经按每月 40 斤原粮的标准消费了几个月;1958 年上半年供应紧张,但是每个月 30 斤左右的标准被坚持住了。姚奎甲在粮食产量上的浮夸和高额征购暂时没有给无为县带来太严重的后果,原因就在于前任县委书记彭醒梦主政期间留下的红利。1955 年双季晚稻的种植面积为 108 663 亩,1956 年大幅增加到 428 932 亩,导致粮食减产<sup>⑦</sup>。11 月粮食收获完毕后,无为县委发现总产量仅为 45 000 万斤<sup>⑧</sup>。正是吸取了 1956 年的教训,1957 年的双季晚稻调低到 227 782 亩<sup>⑨</sup>。这才有了 1957 年年底姚奎甲调任无为要重新扩大双季稻种植时,大多数基层干部的集体抵制:“五六年受灾是人为的,就是三改百分之八十干错了。”<sup>⑩</sup>刘诗古曾讨论了这一逆转在微观层面的反映:“1955 年以前,卞旭生产队基本上不种双季稻。1956 年,该队迫于上面的压力,推行茬口改制,结果造成减产。1957 年则是比较正常的,据调查人员反映,其原因是接受了 1956 年的教训,适当地调整了茬口。1958 年以后,情况又发生了变化,该队的中稻与单季晚稻的种植,回到了一个较高的比例。”<sup>⑪</sup>

① 《姚奎甲在县委扩大会议上总结发言》(1958 年 1 月 3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8-103。

② 食堂在地方的兴起可能恰恰是在返销粮仅仅够维持人们基本口粮的恶劣条件下,为了让农民理性用粮才出现的。

③ 《粮食工作报告》(1958 年 3 月 15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2-1958-082。

④ 《粮食工作报告》(1958 年 4 月 14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2-1958-082。

⑤ 《粮食工作报告》(1958 年 8 月 2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48-2-1958-082。

⑥⑩ 无为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无为县志》,第 132、132 页。

⑨ 徐进:《粮食与政治:论 1956 年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的实施》,《开放时代》2012 年第 7 期。

⑪ 《关于召开二十二次三干会议情况的综合报告》(1957 年 10 月 21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57-089。

⑫ 刘诗古:《粮食产量、高征购、大队干部与“大饥荒”——以白鹤、三益大队为中心》,《学术界》2012 年第 4 期。

问题是,虽然姚奎甲上任伊始就力推农业改制,但是已时至 1957 年 11 月,当年的农业种植比例已经是既成事实了。姚奎甲不情愿地接受了这个结果,指责无为县的干部右倾,期望到 1958 年能来一个农业生产大跃进。他同时也阴错阳差地接下了一个不错的粮食产量。这个产量恰恰就是无为县的干部和农民集体抵制农业改制的结果。超过 6 亿斤的粮食产出保证了因为姚奎甲主导的高征购而绷紧的弦最终没有断。

姚奎甲以芜湖地委书记处书记的身份兼任无为县委书记,使得无为县承受了比过往更直接更强烈的来自地委的粮食征购压力。彭醒梦主政无为时,曾经成功地说服安徽省委向地委施压,缓和了无为紧张的粮食工作。然而,一个由地委书记处书记带领的县委已经很难再以集体名义做类似的事了。吃过粮食短缺之苦的无为各级干部们,试图抵制这个外来书记搞高征购、大搞双季稻的举措,却被疑心宗派主义的姚奎甲打怕、打倒了<sup>①</sup>。

## 五 余 论

通过对 1956 年、1957 年、1958 年三个粮食年度安徽省无为县统购统销实施状况的考察,本文认为正是统购统销制度本身造成了无为县周期性的饥荒。1956 年无为县因为大量种植双季稻粮食减产,加之被施以高征购任务,从 1956 年年底至 1957 年上半年,农村陷入普遍的饥饿之中。这时无为县委认识到农民粮食将要告罄,于是向芜湖地委要求回拨 1.4 亿斤返销粮。但经过讨价还价,芜湖地委只答应调拨 1.26 亿斤原粮。因此造成 1957 年上半无为县农村人口的严重饥荒和非正常死亡现象的出现。很快安徽省委了解了这一情况,在午季收获时向地委施加压力,确保该县农民 6、7 两月人均每月口粮达到了 40 斤原粮。可是好景不长,原县委书记彭醒梦因“救灾”不力去职,1957 年 11 月地委书记处书记姚奎甲兼任无为县委书记。作为外县人的姚奎甲上任后,依据“浮夸”的粮食产量来执行地委下达的过高征购任务,并希望大规模种植双季稻以提高产量。经历 1956 年饥荒的各级留任干部试图抵制上述举措,很快遭到姚奎甲的大撤大换。之后 1958 年 2 月至 5 月无为县每人每月口粮标准又降到 30 斤,此时食堂制度确立以控制粮食消费。幸运的是,彭醒梦 1957 年主政无为期间,全县上下吸取了 1956 年饥荒的教训,或明或暗地抵制了大规模双季稻种植,保证了 1957 年秋季获得了 63 000 万斤的粮食产量。因此,虽然该年征购高达 30 596 万斤粮食,无为县的农民还是挨了过去。

自 1953 年统购统销初始,中共就摸索出了干部上下级之间需要不断讨价还价的机制。1953 年松江省委报告:“我省 85 万吨是可以达到的,但各县所报产量与省估计数字相差很大,省估算全年产量 295 万吨到 300 万吨;而各县汇报数字 278 万吨,后经再三个别检查增到 292 万吨,我们对此仍表示怀疑……不要对各县过早分配任务,要不断酝酿,不断接近。”<sup>②</sup>这个酝酿、接近的过程也就是上下级之间讨价还价的过程。

如果再细致观察无为县委考虑返销粮数量和下放时间,我们会发现 1956 年、1957 年和 1958 年征购之后农村留用粮总量分别为 2.9 亿斤、2.97 亿斤和 3.2 亿斤,那么返销粮总量多少和下拨及时与否就成为是否引起饥荒和饥荒能否引发较多因饥饿死亡现象的最关键因素,而无为县委在考察调拨返销粮数量和下放时间时,以往各年的经验成为他们考量的重要依据<sup>③</sup>。

1957 年 11 月无为县委的变动使得新老县委对饥荒的历史记忆和应对饥荒的经验迥然有异。无为老县委多由本地干部组成,因为经历 1956 粮食年度的饥荒,面临过非正常死亡的局面,其对上级推广双季稻和反瞒产任务都会做力所能及的抵制。而新任县委书记姚奎甲作为地委书记处书记兼任这

① 大饥荒前后无为县委的“派系”变动和这种“派系”因素如何影响到大饥荒中各类干部的行事,笔者希望结合芜湖地委和安徽省委的档案另文讨论。

② 《东北省委发来财经工作电报内有转发松江省委关于粮食会议情况的报告》(1953 年 11 月 24 日),河北省档案馆藏,档号:684-1-566。

③ 1960 年 3 月 18 日,姚奎甲在县委会议上讨论农村统销时说:“去年同期 7000 多万,今年才 5500 万返销粮。”引自《县委会议记录》(1960 年 3 月 18 日),无为县档案馆藏,档号:1-1-1-1960-204。

一职务,他本人并没有 1956 年粮食的深刻记忆。因而 1957 年下半年他为无为县委完成粮食征购任务施加了高压,进行反瞒产运动,并要求大规模推广双季稻。当其一系列举措遭到无为县本地干部抵制时,姚奎甲自然认为这是本地干部的“宗派主义”。于是,他借政治运动之机整肃了一大批具有应对饥荒经验的本地干部。而正是被他所整肃的老县委的“红利”,使他主政的无为县的农民得以渡过 1958 年春夏缺粮之关。

收稿日期 2013—05—15

作者徐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讲师。北京,100872。钟徐楼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硕士研究生。上海,200241。

## The Grain Collection and Local Politics :the State Monopolistic Purchase and Marketing of Grain inWuwei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1957~1958)

Xu Jin and ZhongXu Loufang

**Keywords:** Grain;the state monopolistic purchase and marketing of grain;local politics

**Abstract:** The practice of the state monopoly of grain purchase and marketing in Wuwei county of Anhui Province in the middle of the 1950s demonstrates that it is this institution of grain policy caused periodic famine. The bargains between upper officials and lower ones,and the official control of the amount of returning grains and its time had played key roles in peasant life. The anomaly in Wuwei county politics was intertwined with grain issues. A series of affaires such as the promotion of double-harvest rices , ‘anti-factionalism’and ‘anti-hiding products’ demonstrate the subtle and intricate local grain politics

【责任编辑 公 羽】

---

(上接第 47 页)

## The Narrative Evolution of Fang Xiaoru’s Martyrdom Story and Textual Research of “zhushizu”

Li Guyue

**Keywords:** Fang Xiaoru;martyrdom story;zhushizu;narrative evolution

**Abstract:** Fang Xiaoru was a famous scholar-bureaucrat in the Ming dynasty. He was killed in the campaign of Jing-nan for his loyalty to emperor Chenwen, and was regarded as a model of loyalty by the later scholar-bureaucrats. His martyrdom story narrative has a long evolution process from easy to complex. With the lift of ban decree and rehabilitation,many information had been added in the narrative,especially the story of “zhushizu” which impressed people mostly. But by analyzing the main documents of narrative of Fang Xiaoru’s martyrdom story,we can find that “zhushizu” was just a legend rather than a fact. There is not enough evidence to prove that “zhushizu” has really happened. The narration of his martyrdom story was composed of many factors;the legend of“zhushizu” also has its special factors. Although the legend of“zhushizu” has some real elements,it shouldn’t be regarded as a kind of “fact”.

【责任编辑 惟 正】